

權力資本 雙螺旋

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策畫

吳介民 主編

權力資本雙螺旋

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策劃
吳介民 主編

左岸時事197

權力資本雙螺旋

——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

策 畫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作 者 吳介民・徐斯儉・陶儀芬・鄭志鵬・劉雅靈・陳志柔・古明君
汪宏倫・周碧娥・沈秀華・洪財隆・曾熾芬・林宗弘

主 編 吳介民
特 約 編 輯 廖卿樺

總 編 輯 黃秀如
封 面 設 計 換日線
電 腦 排 版 宸遠彩藝

社 長 郭重興
發 行 人 暨 曾大福
出 版 總 監
出 版 行 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8057
客服專線：0800-221-029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網 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 律 顧 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13年9月

定 價 500元

I S B N 978-986-6723-95-7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成立於2003年，是台灣研究型大學中第一個以「中國」為名的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目標，除了透過研究與教學（中國研究碩士班學程）積極培養台灣的中國研究人才之外，並努力整合現有人力，設定重要議題，推動研究計劃，彙集研究成果，以期開創出具有台灣觀點與國際視野的中國研究。目前的研究方向為：

- （一）產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
- （二）全球化趨勢下的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
- （三）中國式資本主義發展與新興社會力分析；
- （四）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比較研究。

圖片出處

籠罩在雲霧中的東方明珠塔
Oriental Pearl Tower in the fog
©Troy House/Corbis

封面設計

線在創作設計工作室 sunline.liu@gmail.com

目次

第一章	權力資本的雙螺旋運動	
	吳介民	005

卷一 權力・階級・市場・流動

第二章	「黨國」還是「共和國」？	
	徐斯儉	020
第三章	權力交替與「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陶儀芬	056
第四章	市場政治：出口導向製鞋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	
	鄭志鵬	086
第五章	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轉型比較	
	劉雅靈	146
第六章	農村的地位取得：地方制度與菁英流動	
	陳志柔	188

卷二 文化政治

第七章	文物之用？文物體制的商品化	
	古明君	212
第八章	將漢字羅馬化：「跨語際實踐」的文化政治分析	
	汪宏倫	262

卷三 家庭・性／別・親密關係

- 第九章 台商頭家娘：小型企業跨國化的女性與家／庭
周碧娥 320
- 第十章 性玩樂：跨國台商在中國的陽剛展演
沈秀華 340

卷四 跨國互動與比較

- 第十一章 ECFA 與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化」與「正常化」
洪財隆 370
- 第十二章 跨國治理場域中的身分政治競賽
吳介民、曾熾芬 410
- 第十三章 災後重建的政治：兩岸震災的比較
林宗弘 438
- 參考書目 484
- 致謝 522
- 作者簡介 524

權力資本雙螺旋

台灣視角的中國／兩岸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策劃

吳介民 主編

目次

第一章 權力資本的雙螺旋運動	
吳介民	005

卷一 權力・階級・市場・流動

第二章 「黨國」還是「共和國」？	
徐斯儉	020
第三章 權力交替與「政治經濟景氣循環」	
陶儀芬	056
第四章 市場政治：出口導向製鞋業的歷史形構與轉變	
鄭志鵬	086
第五章 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轉型比較	
劉雅靈	146
第六章 農村的地位取得：地方制度與菁英流動	
陳志柔	188

卷二 文化政治

第七章 文物之用？文物體制的商品化	
古明君	212
第八章 將漢字羅馬化：「跨語際實踐」的文化政治分析	
汪宏倫	262

卷三 家庭・性／別・親密關係

第九章	台商頭家娘：小型企業跨國化的女性與家／庭	
	周碧娥	320
第十章	性玩樂：跨國台商在中國的陽剛展演	
	沈秀華	340

卷四 跨國互動與比較

第十一章	ECFA 與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化」與「正常化」	
	洪財隆	370
第十二章	跨國治理場域中的身分政治競賽	
	吳介民、曾熾芬	410
第十三章	災後重建的政治：兩岸震災的比較	
	林宗弘	438
參考書目		484
致謝		522
作者簡介		524

第一章

權力與資本的雙螺旋運動

吳介民

泥鰍般的當代感

從追尋「定律知識」的角度看，「中國研究」如同所有的「區域研究」，是一門進展緩慢的學科。經常有人說：中國難以捉摸，變動速度快、變化幅度大，而這個蛻變中的「當代感」，更如泥鰍般滑溜。但這並不妨礙人們關注中國的興趣，甚至誘引更多優異的心靈投身其中。

後毛時代三十幾年來：

- 中國經濟猛暴式成長，出口暢旺，蔚為崛起的強國，但政治發展「內捲化」，政治改革停滯不前。
- 民間社會日益掙脫高壓，社會組織蓬勃，群眾抗爭不斷升高，要求民主與自主，但政權投入驚人維穩經費，使維穩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讓國家「公安化」，刑罰之外用錢買穩定，將中國煉成了獨特的警察國家。
- 高成長加上高財政汲取，使中央政府與國營企業掌握巨額資金在全球收購，然而因為財富分配的不均等，當出口導向工業化面臨動能耗竭的轉折點時，政府試圖發展內需市場，卻面臨中下階級購買力不足的難題。

- 北京在1997年取得香港主權，撒下重金收買香港各股力量，結果卻引發一波波激烈抗爭，香港人的社群（本土）認同也節節攀升。
- 中國對台關係亦類似，主權宣稱進逼、複製香港模式、採購／收買策略，雖有收效，卻也引發更多的預警與抗拒，而「台灣因素」也反作用於中國社會。
- 更加饒富興味的是，中國政權高壓治理，社會傷口汨濫之際，卻有政治學者指出：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中國人自認比鄰近一些民主化國家，享有更高程度的民主。

如此矛盾力量的交會，百花齊放的消息，皆是中國（及其與周邊國關係）的真實切面。快與慢、衝撞與煞停、斷裂與連續，多重節奏交疊出一幅複雜鮮明的當代史。中國實力暴漲，既引發世人矚目（與側目），也帶來全球性的效應與焦慮。如何精準掌握中國的發展動向，是中國研究學界最大的挑戰。中國作為一個複雜而多變的「系統」，的確難以簡單幾條「定律」或「規則」去概括，但仍有若干「結構」、「模式」、「形態」、「機制」、或「作用力」隱約浮現。嘗試從各種角度切入這複雜系統，掌握當代中國與兩岸關係的變化趨勢，是本書各章之間共通的線索。

權力資本雙螺旋

後毛時代中國發展模式的一條主要線索是：權力與資本的雙螺旋運動。「雙螺旋」挪借自分子生物學的啟發，用來觀察權力（政治力）與資本（經濟力）這兩股力量，如何互動、交纏，激發中國變化的動能。當然，政治力與經濟力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除

此之外，意識形態（理念）作為一種社會力（ideological power），以及武力（military power），也經常左右社會動向。例如，在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一度是國家變革（以革命運動改造社會）的推手，而武力則是拱衛革命的最後手段。在後毛時代，意識形態的作用退位給經濟力；政治力則貫穿著整部當代中國史，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展現方式。這裡，對於人類社會中各種「力」的互動、結合、對抗之分析，借助於Michael Mann（1986）發展出來的架構。

在這條線索導引下，我們可以觀察到：權力（政權）與資本相互為用，如何促成了高成長模式——所謂「中國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徵。後毛時代的第一個階段，大約從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二〇〇年代初期，在國際經濟結構重分工的脈絡中，以各級政府與外資結盟為主軸，推動了一長波「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簡稱「EOI 模式」）。第二階段的主旋律，大約從二〇〇〇年代初期迄今，是由政權結合國營資本與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所驅動的成長模式。這個階段，國營企業重新取得了對關鍵工業與服務業的壟斷性控制權，在許多部門排擠了私有部門，而產生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

這條主線索是簡化描述。兩階段的區分，也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其實貫穿整個「改革開放」年代的，另有其他顯著的共通現象：氾濫的「圈地運動」與地方政府愈來愈依賴「土地財政」；「城鄉二元體制」歷經了緩慢的制度變遷，進而催生了一個新的「農民工階級」，成為中國成長模式的一大支柱。具體的歷史過程，也牽涉到更多「政商關係」調整以及「制度變遷與創新」。例如，推動 EOI 模式，需要從農村擠壓出「剩餘勞動力」（農民工），也同時需要中央層級配套的外匯制度改革與稅收制度改革，

這兩項都從1994年開始進行（參見吳介民 1998、2000、2011）。而在區域或地方層次，工業化的機構建制，涉及到各地競相「闢建開發區招商引資」，這樣的「政治經濟行為」需要在地方層次上取得「認知正當性」方能推行，其中更牽涉到制度學習、模仿、與傳散的過程（陳明祺，即將出版）。

上述兩階段之間，除了連續性的演變，也有斷裂現象。「EOI 模式」在第二階段面臨「動能耗竭」，包括出口市場的飽和與競爭、加工貿易政策轉向、「剩餘勞動力」耗竭導致的勞動成本增長、環保標準提高等問題。在此宏觀變化下，台資在中國的營運，也面臨新的情勢。以往只靠台商與地方官員交際，便能運作順暢的「關係政治」，如今不再無往不利；市場政治裡的權力位階關係，更拓展到國際買主、代工台商、地方政府與農民工等多方行動者之間的競逐。2000年之後，中央政府主導查稅行動，開始介入地方政商關係的共謀結構，意圖增加其利益分配的份額；同時，由勞工運動施壓而來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卻讓國際買主藉由「轉包」，轉嫁責任到代工廠身上，意外地造成部分工人的利益損失，這些新的情勢，使得中國勞力密集加工出口業之經營環境產生劇烈的變動（參見本書鄭志鵬）。於是，過去幾年來，廣東台資歷經了快速的組織調整與遷徙，一部分內遷至內陸省份，一部分則外移至越南、柬埔寨，緬甸則在晚近成為「冒險新樂園」。

在「雙螺旋運動」的「作用力」中，社會領域和文化場域如何與政治力與經濟力互動？如何激發對應或因應的行為模式？例如，中國龐大的文物遺產，不論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財、或是晚近「發明的新傳統」，在各級政府創收與尋租活動的驅力下，展開以「合理利用」為論述，而競逐地方文物治理、以及文物商品化的建

制。這是「權力創生資本」的一種典型操作模式，也是權力資本對文化領域的外延作用力（古明君）。類似的驅力，也表現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城中村」的改造，催生了一批由「農民身分」轉化而成的「收租階級」（劉雅靈）。農民身分是毛澤東時代，政權為控制人口移動並加速國家資本積累而設計的制度（城鄉二元體制），在市場經濟發展與都市化轉型過程中，一批在工商業發達地區的農民，成為了坐收租金的新階級；而「集體產權」的制度背景造成了村民「再集體化」的現象。這個變化過程，體現了制度論研究取向中的路徑依賴特色。農民收租階級，也是權力資本邏輯運作下的外延產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深刻影響農村菁英的流動過程。村幹部（政治菁英）地位的取得，影響因素包括人力、政治、社會、資本等各類「資本」，以及村集體的民主化程度；而成為經濟菁英的主要因素在於「人力資本」，以及是否身處「經濟快速成長」的村落（陳志柔）。另外一種與權力資本發生互動的模式，則是充滿對抗性的社會抗議與維權運動。因為國家或資本的掠奪——或者更經常是，國家與資本結合而成的雙重剝奪，使得社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反抗行動。中國每年幾十萬起規模超過百人的「群眾事件」、蔓生中的維權社會網絡、以互聯網為串流載體的網民「圍觀」世界、強調社區環境生存權的中產階級反PX運動、非幹部農民爭取土地利益的烏坎事件，皆可視為對「權力資本雙螺旋」的反撲。但是，這些反撲行動（或反作用力）都要置於具體時空與人文脈絡中分析，才能掌握作用其中的「因果機制」。

一黨專政的邏輯

中國的公民意識在威權鎮壓下緩步成長，社會也無所不在地反抗權力資本，凸顯了政權的正當性危機。中共政權位處雙螺旋的核心，過去幾十年，不斷針對新的情勢作出回應，發展出所謂「韌性威權主義」的現象（Nathan 2003）。中共有相當能力對升高中的社會抗議，作出正面或負面的回應，前者包括局部的行政改革，以吸納民怨；後者則包括維穩體制的強化，增加鎮壓恫嚇能力。在這一系列複雜的策略互動過程，逐漸隱現了某種「共和國邏輯」，強調憲政論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與監督功能，以有別於中共傳統的「黨國邏輯」。黨國的本能是追求一黨專政、政權存續。近年來，中共善於利用「共和國邏輯」，使用變相吸納與管控打壓的雙面策略，反而鞏固了黨國邏輯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徐斯儉）。

一黨專政的另一個內在邏輯是：權力繼承者由統治團體內部產生。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市場經濟」被引入社會主義體制，「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現象就可能變得顯著。就一般理論而言，導致 PBC 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行動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然而，同樣的行為模式，中國與西方選舉民主國家存在顯著差異。在民主國家，主要是現任政策制訂者，為達到勝選的短期政治目的，所引發的討好選民的機會主義行為；但在中國，主要是每五年中央政府「換屆期間」，集體領導控制投資擴張「暫時失靈」，地方政治菁英趁勢增加投資的機會主義行為。從這個角度看，中國 PBC 的存在，可以佐證「政治制度」對政治菁英行為的制約有強化的趨勢（陶儀芬）。中共是一個沒有「選民」的政權，其權力繼承的運作，乃通過自我指定、自我再生

產，但是中國特色之 PBC 現象的確認，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或這類）政權內部博弈的行為機制，及其「演化」的軌跡。

一黨專政的「歷史使命」是「富國強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中國究竟邁向現代「民族國家」或回返傳統的「天朝體系」，學界尚爭吵不休，但一個總體趨勢是：中國的國家機器「中央化」與「集權化」能力在大幅度提升。其中，國家對於文化場域的駕馭與引導，便是此霸權工程的一部分，「漢字羅馬化」可貼切說明之。漢字羅馬化歷史悠遠，最初來自外國傳教士之手，歷經多方力量角逐；即使中共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出台，漢語拼音還是要等到七〇年代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才取得主導性。結合劉禾提出的「跨語境實踐」以及 Bourdieu 關於「實踐」的分析概念，漢字羅馬化乃是資本轉置與符號權力鬥爭，透過政治與文化場域所呈顯的結果／實踐。漢語拼音作為「跨語境」的「實踐」，帶來的不只是一種新的意符與意指的對應關係，更蘊含著一整套符號權力的建立與事物秩序的重組，成為國族建構中的重要力量。而且藉由專名戰爭、改變分類法則與書寫規範，建立並影響了國族觀與世界觀（汪宏倫）。

「台灣因素」的樣貌

中國國力提升，台灣也籠罩在其權力資本雙螺旋的輻射之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略稱為「兩岸關係」），一方面是中國這個複雜系統的「外延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複雜性的一個「構成元素」。

「中國因素」對台灣各領域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語言文